

《风流才子》中的欲望书写研究^{*}

龙瑞翠

(燕山大学 秦皇岛 066004)

提 要: 戴维·洛奇最新传记元小说力作《风流才子》以半采访体叙述方式,从个体与公共伦理两个层面叙述主体威尔斯对爱欲——人类最根本欲望的认知,厘析个体欲望与公共伦理意识之间的张力以及多重欲望主体之间的对抗与依存关系,探索符号自我在“过去—当下—未来”3个维度的内涵,勾画个体历史符号性的自我图式,探析个体自我存在的状态与价值。

关键词: 戴维·洛奇 《风流才子》; 欲望书写; 身体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5)06-0169-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5.06.034

Decoding the Desire Writing in *A Man of Parts*

Long Rui-cui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 Man of Parts, which is David Lodge's latest meta-biographical novel, initiates a new mode of narration, the quasi-interview consisting of the omniscient narrative, limited narrative perspective narration and the inner dialogues of protagonist. Hence, the novel explores Wells' cognition of sexual desire from both individual and public ethical perspectives, and decodes the connotation of semiotic self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by illustrating the arguments and supplements of inter-subjectivity among multiple-desire subjects. Consequently, *A Man of Parts* delineates the self-schema of individual historical symbol, the living situation and values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Key words: David Lodge; *A Man of Parts*; desire writing; body

1 引言

戴维·洛奇最新传记元小说力作《风流才子》(*A Man of Parts*)以威尔斯对两性生活的思考为叙述主线,聚焦威尔斯的意识内部,“填补了传记作家无法实现的诸多关于人物意识思维层面的空白”(Blackwell 2013)。因此,小说一出版便在学界引起极大轰动,被认为“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将是最好的传记小说之一”(Fay 2012)。学界多将其与洛奇另一部传记元小说《作者,作者》(*Author, Author* 2004)进行互文解读,分析威尔斯与亨利·詹姆斯两个小说人物形象的异同,以挖掘《风流才子》的创作动因;示主人公威尔斯的性格特征、性爱生活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关注《风流才子》独特的叙述形式及其作为历史传记

小说的价值等。这些分析为解读《风流才子》的创作动因、文体特征及叙事策略等提供视角,但它们多为简明书评,未能深入探讨洛奇以威尔斯的个体欲望作为小说叙述切入点与叙述主线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运用融合全知叙事、人物有限叙事和人物内对话叙述等形成的半采访体(quasi-interview)叙述方式来呈现威尔斯在个体欲望与公共伦理之间的苦苦挣扎。

2 主体的欲望认知:个体欲望与公共伦理意识的张力

小说叙述一位风流才子的私生活:第一部分以二战烽火中威尔斯生命行将结束为开端,面对死亡,他的意识

^{*} 本文系河北省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戴维·洛奇 21 世纪小说文艺思想研究”(HB14WX001)及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戴维·洛奇 21 世纪小说文艺思想研究”(SD141075)的阶段性成果。

以一种由缓到急的自我采访和质问形式回顾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婚姻生活;第二、三、四部分以威尔斯的性觉醒、对自由之爱(Free Love)的认知与追求为主线夹叙夹议地呈现其婚姻生活、他与诸多女性间的张弛关系及其与费边社的关系;第五部分叙事回到二战烽火中,生命垂危的威尔斯因为被爱所弃而深陷焦灼的生存状态。可以说,小说通篇都萦绕着威尔斯浓烈的性爱欲望,而这再次证实英格顿早前的断言“自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以降,‘人生有性爱的欲望’已成为英语小说的惯常设定”(Eagleton 1988: 98)。终其一生,威尔斯都在以雪莱为偶像,追求波西米亚式的“自由之爱”,以期赋予此在世界以意义(Lodge 2011: 66)。然而,由于时时受到公共伦理及自我理性的显隐挟制,因此他对自由之爱的探索过程充满曲折。

生活在尼采身体哲学盛行的时代,威尔斯坚信自我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身体,它决定并主宰一切,是充满欲望和本能的躯体。在威尔斯符号自我的当下内涵中张扬浓郁的肉体欲望,尤其是爱欲。在他看来,性欲是舒缓各种家庭、创作压力以重获活力的途径,但性之于他又不仅是一种动物的欲望本性,还与美密切相关。在描述那些让他获得欲望满足的女性胴体时,随处可见的是与希腊神话中那些能勾起人类审美情感的词汇与典故。而真正能让他沉醉的女性也是秀外慧中。换言之,他对女性的欲望还具有更高一层与审美具有同样旨归的精神意识内涵,即“爱”。这一爱欲的满足“作为一种生命意识,既是一种肉体意识,同时也是在此基础上对单纯的肉体感觉的超越”,它是伊甸园时代亚当与夏娃式、容不得一丝一毫束缚、彻底的“爱”与“欲”完美结合的自由之爱,只有基于这一自由之爱的两性关系才是自由、健康、生气盎然的(徐岱 2001: 375)。

但这一灵肉交织的爱欲却是当时社会的重大禁忌。威尔斯的第一任妻子坚守万事“得体和美”的信条,拥有维多利亚时代理想妻子的所有品性——温柔、善良、忠诚与无私,是长期处于强势母亲压制下的威尔斯一心渴望的娇妻。然而妻子对肉体欲望的淡漠与自我压制却让威尔斯惊恐地意识到:她的肉体欲望,特别是性欲,已被社会无情阉割,尤为可怕的是她竟然还欣然接受这一阉割,将性生活当成是女性不得不承受的生活重负。威尔斯认为,这一可悲认知是维多利亚社会对女性意识禁锢的结果。要想重获人性自由,就必须消除这一压抑性控制。因此,他严肃地质疑当时社会理想女性的评价标准与性爱伦理,极力构建一种新的性爱伦理原则:自由之爱的唯一动机是爱欲满足,只有肉体与精神欲望均得到满足,人才能真正发展。为实现这一理想,他努力写作、加入费边社乃至成为一战的旗手,由此将私人领域的欲望追求融入公共空间的权力关系中,以期实现私人与公共两个空间的交织为一。因此,当德国人嘲笑他关于人类

社会的乌托邦梦想时,他感觉身体里正膨胀着一种新的信条与使命感,那就是他必须为一战摇旗呐喊,只有如此方能结束现实中两性关系的诸种拘役。然而战争暴露出来的残暴与光怪陆离却使其不得不反思一战的自私本质,尤其是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旗手角色。这些沉痛反思不仅彻底碾碎他的乌托邦理想,也碾碎他所有的骄傲,让他痛不欲生。“死”的念头时时萦绕着他。这一作为自我意识最深层的死亡意识,虽然促成威尔斯“精神之生的醒悟和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的萌生”(程党根 2006: 810),却又使他那曾经看似可以言说的个体性创伤彻底变成难以言说且不愿言说之物,使他深陷厌战情绪中。由此,威尔斯的个体性创伤汇入集体性战争创伤之流。然而,叙述者只有借助倾听者才能将创伤体验重新外化,公正地阐释过去之我以便重建积极乐观的当下之我。当威尔斯欲以死亡的方式结束与外界的联系时,便意味着他的创伤必然无法得以康复。

此外,虽然威尔斯宣称其自由之爱“是一种相互给予与接受的愉悦”(Lodge 2011: 21),但他自由之爱理念的始归点均是其作为男性的自我欲望满足,而女性不仅要迎合男性的性需求,同时也要成为男性事业的协助者,更须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家庭天使的气质。因此,尽管他标榜自己与第二任妻子简的婚姻是建基于自由之爱,但在这一婚姻中,真正享有性爱自由的却只有他。而且当其头脑中的理性声音对这一婚姻提出质疑时,他的本能急忙诡辩:简不想要情人。然而全知叙事声音却告诉读者:他没完没了的婚外情已深深伤害简,婚姻之于她是监狱而非天堂。另外,虽然他总是声称极度向往那种叛逆世俗公共伦理以追求绝对性爱自由的波西米亚式两性生活,却又谨小慎微,安常守故,认为那种生活方式太胆大妄为和喧嚣烦扰。而全知叙事者通过呈现威尔斯作品对乌托邦社会的描述进一步展示他对性的双重标准:女性必须忠诚于丈夫,而已婚男性则可以完全自由地与其他女性发生性关系。正是由于内对话中第二人称的欲望之我不仅直接受理性之我(这一理性之我经常与内叙述中的理想读者重合)的监控,而且还受全知叙述者及小说读者在更高层的监控与评判。因此,在他回顾过去之我的爱欲追求时,总流露出一种不可自知的自私性与情感偏见,从而导致其叙述出现不可信的危险。为解决这一问题,当下之我极力为过去之我辩解。然而恰是这一辩解吸引读者去仔细分辨其中的信息以跟上他的叙述,进而发现其言语中的自我狡辩,反向加剧其叙述的不可靠性。

事实上,他也时常为自己背离世俗标准以构建新原则的行为所困扰,乃至深陷“被原则与践行的矛盾撕裂”的焦灼状态中(Lodge 2014: 230)。为摆脱这一困扰,他在为自我爱欲满足做辩解时,常故意做出歪曲性伦理评价。这一行为虽然暗示叙述主体对所处境境集体伦理价值取

向的自觉性,却也使他经常痛苦地徘徊在接受与背叛这一伦理取向之间。面对理性之我的苛责,虽然潜意识里他知道自己极度自私,却通过一次次的自我辩解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局促不安与焦虑,进而催眠自我良知。

无论威尔斯对自己欲望的完全满足津津乐道,还是急迫地为自己的自私行为辩驳,都是在以自我反省的方式向读者呈现一个极具阴柔气息的自我形象,以隐藏与他人关系中将自我客体化的真实欲望。他因自我形象(五英尺五高、长相平庸)与卑微出身(仆人之子)而产生的自卑情绪使其自我身体完整性与社会身份定位受到极大威胁,且这一威胁感并没有随着他社会地位的提升而真正消逝,反而“持续地、侵入式地返回”威尔斯的思维意识之中,不断侵扰并折磨他,使他始终处于缺乏安全感的焦虑中(Caruth 1995: 6)。为获得自我存在的安全感,他极度渴望获得社会他者的群体性认同。为此,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我欲望“非我化”,对自己每一次出轨的托词都是受他人诱惑,由此将自我的欲望叙述为:因为他人对自己不可抵挡的诱惑。然而读者通过全知叙述者的声音却发现,这些行为均源自他本身强烈的欲望冲动。通过一遍遍地强调自己“被诱惑”,他期望掩盖自己对被他者重视与正凝视、进而获得主体身份合法存在的渴望。而且通过这一自我客体化的方式叙述自我欲望经历,威尔斯也在召唤读者的在场以真实体会他的感受,并理解甚至部分认同他的种种欲望及对欲望的种种阐释,进而获得、确认其主体身份。然而随着叙述的展开,在他“被吸引”的渴望不断膨胀的同时,拥有“被吸引”的状态却在不断失去。尤其是当暮年的威尔斯发现自己的当下欲望被证明彻底无法实现时,当下之我的困顿被无限放大,乃至陷入一个彻底被疏离的自我沦陷世界。

3 多重欲望主体间性: 对抗与依存

为有效摹拟威尔斯肉身欲望与公共伦理意识的动态张力过程,《风流才子》充分运用多种叙事声音与叙述策略来呈现威尔斯的焦虑与挣扎,以书写主体威尔斯如何实现自我存在的新统一与平衡并获取个体存在的历史意义,进而彰显洛奇关于个体历史符号的自我图式构建。而读者在倾听这些多元叙述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威尔斯作为欲望主体的存在,还可以看到其他多重欲望主体的存在及这些主体间的互相辩驳、对抗、依存与补充关系,进而通过辨析这些主体间性作出自我伦理道德评判。

首先,洛奇模仿威尔斯晚年之作《挫折的剖析》(*The Anatomy of Frustration*)中人物的对话叙述形式,以第二人称叙述形式,即主人公思维内对话方式,剖析威尔斯的性生活以填补人物意识思维的空白处。在威尔斯头脑中总有一个客观冷峻的理性声音与当下之我的欲望之声进行

愈演愈烈的争辩,正是通过这一争辩,威尔斯实现以记忆性叙述形式重写和编码其个体历史,从而使他作为历史人物的自在性与客观性变成一种极具私人性的自述故事。不同于第一人称中因为“我”的权威性存在而诱使读者可能完全认同叙述者的话语,也不同于第三人称中由于叙述主客体间隔着一个毫不相干的“他”,导致叙述者与读者都与故事保持超然的心理距离,在这一内对话中,“我”被分裂为主体我(常被当下的欲望之我占据)与客体我(时而化身为理性之我,时而变身为过去之我)。主体我与客体我同时作为言者与听者共时面对所发之言。由此,小说不仅清晰地呈现威尔斯“那些被人们指责的错误与愚钝,同时也让他进行自我辩解”(Lodge 2014: 229),使其得以运用写作技巧及叙述技巧来规避欲望给他带来的不良后果,实现“在自我意识、自觉和反讽的自我疏离等不同层面上返回了叙事行为本身”(柯里 2003: 70)。而且,通过将个体的创伤历史作为自我辩白的证据,威尔斯还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力来建构对他创伤性体验的想象图景,引诱读者不自觉地扮演他理性之我的角色以进入叙述文本创造关系中,最大限度地开启叙事交流域,影响读者认同其言行思动。然而,威尔斯最大限度地叙述自我欲望经历也使他陷入无休止、充满矛盾的内对话:一方面他渴望建构新伦理规范,另一方面又羞羞答答地臣服于传统伦理规范。这种矛盾的不断升级使他逐渐被过于沉重的叙事编码所压垮,从而陷入表征危机。虽然威尔斯看似处于对话中,但这种对话却是绝对封闭的内对话,对话中存在的“我-你”关系是主体内间性,旁人根本观察不到他通过回忆过去以探讨人生意义的内对话,因此必然无法对其理解、回应和疏导调节。而外部他者回应与疏导的缺乏又使这一内对话极易陷入对欲望的自我复制与反复播放,语言的表征功能被彻底消弭。因此,他注定无法通过叙述来舒缓压抑欲望带来的痛楚,也就无法获得创伤救赎。正是由于该内对话在忽视社会他者同时又不愿意与他者我(理性之我)协同,它树立起来的主他关系不可能像《作者,作者》那样能产生互相包容与对话的结果,主他总是呈拉锯式挣扎状态,并促发叙述的产生与无限延宕,而这则使威尔斯的叙述兼具文学的个人历史性与个人历史的文学性,从而削弱他对自我个体历史阐释的权威性与客观性。因为“真正的写作不可避免的是一种自我揭露。即使这不是公然的自传,也会间接地反映你的恐惧、欲望、幻想与特权”,当洛奇呈现威尔斯孤独与凄凉的生存状态时,又何尝不是在隐晦地叙述自己晚年的生存状态:日益严重的失聪使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与他人进行交流的能力,只能将自我分裂为主体我与客体我,进行充满矛盾欲望的内对话(Lodge 2002: 111)。

此外,还有一个作为有限叙事视角的叙述者的声音

存在于威尔斯头脑中。这一相对真实与客观的声音不仅填补内对话式叙述的留白,也使读者得以摆脱在内对话中与“理性声音”趋同的情形,从而可以更客观地审视叙述主体威尔斯的所思所想。正是通过该声音,读者能清楚地获知:欲望之于威尔斯,不只是一种思考,更是一种书写过程与结果——是艺术尤其是文学诱发他沉睡的欲望,同时其肉体欲望又经过他的想象力形塑成为纯化欲望,使自卑的他一次次获得生命的欲望与激情,并开始其创作生涯。爱欲的满足与否成为影响他创作动力的最重要因素,当这一欲望获得满足时,他便创作出鸿篇巨著,书画其理想的性乌托邦,构建未来之我的生存状态。一战后爱欲的匮乏则使其创作生涯走向衰落,乃至处于失语状态。而且,由于“连接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的第一道桥梁就是叙事”通过对自我欲望的记忆书写,尤其是以男性性欲望的满足与困扰作为其作品的重要主题来投射他关于政治、艺术等的看法,据之厘析并呈现自我生存状态和定位自我身份,威尔斯不仅显示出个体潜意识的涌动,而且使其书写留有集体与传统的印记(陶东风 2011: 15)。

虽然当下的主我威尔斯看似占据主体地位,但头脑中的这些声音却时刻都在提醒、挑战当下之我的欲望渴求、意识及伦理价值观等,使当下之我向下跌落为过去之我的客体,“扮演他人的角色”来客观地观察自己,自己则成为自我符号所指的过去之我,而自我曾经历的欲望体验反而上升为自我所使用的一个符号,它不停地与当下之我互相置换以诉说当下急迫的欲望,充实自我的符号意义,向未来展现尚待形成的自我形象。但威尔斯这一自我客体化行为实际上并非纯粹的个体内对话,而是隐含威尔斯作为欲望个体与社会他者的对话,因为“只有采取在某一社会环境中其他个体对待他的态度,才能成为他自己的客体”(萨哈金 1991: 144)。正是这一社会他者使个体的行为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同时通过欲望主我与社会客我性乌托邦展开的互动与对话,主体威尔斯才具有叙述的冲动欲望,并期望能以文学创作的方式获得爱欲的满足与释放,从而使叙述本身看似已成为一种唯一可以永恒化的固我存在方式。然而,过去之我的欲望之所以单纯和热烈是因为它是体验本身,一旦他开始将自己的欲望视为客体来研究时,它除了是直接体验本身外,还是一种对当下体验自我保持距离的理解、把玩与叙述。它迫使威尔斯的自我从主我向下移到客体位置,并使威尔斯的符号文本吞噬其当下体验着的我。与此同时,叙述者威尔斯还通过符号文本的自反性隐晦地呈现一个无时不渴望成为他者欲望之客体的阴柔自我符号来反向张扬其主体性存在。正是在这一叙述之我与当下体验之我相重合的自我哀怜式同步叙述中,威尔斯通过呈现其对自我的叩问、质疑、反思及其对当下之我的自怜来实现对过去之我叙事话语的强大自辩与未来之我的叙述

构建。

但是,《风流才子》又不局限于这一形而下、从心理需求层面寻找情绪宣泄与抚慰的欲望叙事。在威尔斯这一主我与客我话轮迅速转换的内对话与有限叙事视角叙述之外,一个全知全能的故事外叙述者,即隐含作者的声音也时隐时现地参与并延伸对主体认知中的形而上思索和对人类终极意义的索问,从而不断丰富主体威尔斯的符号内涵。读者通过考察这一“小说中角色‘扮演’的主题来审视小说的虚构性”,以明辨虚实(Waugh 1984: 116)。与此同时,作者洛奇又在小说扉页的题记中声明本叙事几乎所有内容均有事实来源依据,并在多达数页的致谢中详细标明事实出处,由此以副文本形式陈述自己的写作选材、创作过程、文本结构安排等,进一步参与小说中威尔斯的主体建构,澄清并充实故事外、小说内的“虚实”话题。正如《卫报》评论所言,“优秀的传记小说的价值——《风流才子》就是一部优秀的传记小说——在于它能让你产生寻找原始出处的冲动。问题在于,在你查阅之前,无法辨别究竟何为真实何为虚构”(Morrison 2011)。洛奇故意模糊化处理隐含作者“我”的真实存在与素材选取的真实性与虚构性的界限的做法,不仅加大读者对小说中威尔斯、对隐含作者及真实洛奇所阐释的威尔斯的认知与评价难度,而且因为须要兼顾隐含作者、事实作者洛奇、隐含读者、真实读者等多个维度,对威尔斯未来之我的图式构建更趋艰难复杂。

正是通过隐含作者声音及副文本的介入,洛奇在呈现威尔斯书写自我欲望与公共伦理间的内对话与激烈争辩中,也在书写自己探索文学创作之秘的欲望。首先,通过描述威尔斯对小说域度的思考,洛奇提出在小说这一域度中应涵括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类的思想生活,由此也道出洛奇一直坚持以回归传统全知叙事方式写作的原因:小说应该是故事与思想的完美呈现。其次,洛奇通过呈现威尔斯与亨利·詹姆斯对文学与政治关系张力的不同认知,提出文学是对政治的纠正,它通过虚构与想象的力量可为现实提供一种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全新视角,为人类生存提供更为微妙真实的叙述。换言之,传记小说是建基于生活的半虚构性事物。此外,洛奇还在致谢中罗列大量的写作素材来源,尤其强调巧用主人公的信件手稿,让其为自我行为辩解,暴露其自相矛盾之处,从而赋予小说以细节上的环境性、特定性和真实性,以其明确的时间性与事实性而成为稳定的参考系,为读者确信小说的虚构成分提供证明。然而在这一充分利用历史记述的结构框架中,由于材料筛选与组织均源自作者本人,而且作为全知叙述者的隐含作者不仅可随时进入叙述层与人物展开对话与讨论,还可随时抛掉参与者身份回到元叙述层面,与小说人物保持距离,因此读者可以清晰地获知洛奇如何收集与

整理材料,并进行小说创作。由此,洛奇清楚地阐明他对传记小说创作的认知与思考:以融合自我指涉与实证主义的填补型虚构方式,通过巧妙书写历史人物威尔斯的心理与言行构建宏大历史,实现文学性与历史性的兼收并蓄。这不仅可以打破传统传记的纪实镣铐,使传记叙事更加人性化和非叙事伦理化,也能弥补后结构主义对虚构的过分夸大,使传记小说呈现出内部机体与骨架构造的多样化与视角的多元化。正是基于这一认知,洛奇不仅批判斯基德尔斯基(W. Skidelsky)一派对传记小说虚构性的过度偏爱,也质疑比弗尔(A. Beevor)一派对传记小说真实度的过分强调。在他看来,传记小说为人们解读真人真事提供一种新方式“小说家通过将自己想象性地植入历史人物的意识中,可恰当解读传记材料所谓之事实”,从而使文本获得美学的价值,使主人公成为鲜活的人(Lodge 2014: 249)。

正是这些叙事声音及叙述策略的运用,《风流才子》才能打破传统传记小说文本结构中线性时间与单一化人物中心的平铺直叙,进行以性欲望为中心的多方对话;才能比历史文献档案更详尽地展示主人公的心理与思想,并且使多个意识主体乃至读者都能自由地参与到这一对话与辩论中,消除作者、文本及读者间的距离,通过书写者直接书写自我的不及物写作方式,打破历史时间与话语时间、主体与客体、施动者与被动者的界限,邀请读者一起参与文本的创作。这不仅增强小说阅读伦理意识的难度,也使文本呈现多元开放性。同时,由于小说以主人公肉体欲望作为叙事切入点与聚焦点,所以小说这一跳出情节框架和线性时间束缚的叙事结构不仅没有呈现出碎片式结构,反而使主体得以自由地同时在过去-当下-未来3个时间层面间游走,从而形成一种包括所有时间层面的格拉斯式“第四时间”,以规避传统传记小说的忠实性与连贯性、历史性与文学性等矛盾,更灵活生动地呈现威尔斯对其性乌托邦的描画及其因与社会公共性伦理严重脱钩而产生的困扰与焦虑,赋予传记小说这一题材以新的生机。

4 结束语

洛奇以“欲望”作为切入点与叙述主线,向读者呈现有限叙事声音、全知叙事声音及威尔斯意识与潜意识关于两性关系的内部争辩,以便揭开威尔斯隐藏在世俗(理性)欲望下的秘密欲望,从而解构其作为文学名流的传统正面形象。在此基础上,小说又通过呈现威尔斯对于个体自我协调和统一的寻求及其感情和思维在此间的变

化,重构一个不完美、矛盾、但有血有肉的威尔斯。由此,《风流才子》不仅书写个体内部伦理认知及其与公共伦理的张力关系,从而实现现实的文学穿透与批判,而且使小说实现文本的历史与虚构的完美结合,为传记小说创作提供优秀范例。同时,小说通过呈现多元叙事视角,尤其是人物内部微对话,剖析多重欲望主体之间互相辩驳与对抗、依存与补充的关系,也探析个体威尔斯作为符号自我的“过去-当下-未来”3层内涵,进而勾画洛奇关于个体历史符号性的自我图式:只有在肉身欲望与意识主体的共同作用下,符号自我才能获得充盈的涵义,形成灵肉交织的身体主体。

参考文献

- 程发根. 欲望[A].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编,西方文论关键词[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马克·柯里. 后现代叙事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陶东风. “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J]. 文艺研究. 2011(6).
- 威廉·萨哈金.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 徐岱. 美学新概念[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1.
- Blackwell, G. David Lodge Talks about His New Book *A Man of Parts* [OL]. <http://yorkshiretimes.co.uk/article/David-Lodge-Talks-About-His-New-Book-A-Man-Of-Parts>, 2013.
- Caruth, C.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M].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Eagleton, T. The Silences of David Lodge [J]. *New Left Review*, 1988(1).
- Fay, S. Sex and Prophecy [OL]. <http://www.newrepublic.com/book/review/sex-and-prophecy#>, 2012.
- Lodge, D. *Thinks...* [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2.
- Lodge, D. *Author, Author* [M]. London: Secker & Warburg, 2004.
- Lodge, D. *A Man of Parts* [M]. London: Vintage Books, 2011.
- Lodge, D. *Lives in Writing* [M]. London: Harvill Secker, 2014.
- Morrison, B. A Man of Parts by David Lodge — Review [OL]. <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11/apr/10/man-parts-david-lodge-review>, 2011.
- Waugh, P. *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 [M]. London: Methuen, 1984.

定稿日期: 2015-09-05

【责任编辑 陈庆斌】